李福林等回擊廣州共黨

▲電調省外軍隊一定十三晨下總攻令——廣州事變之因果

香港十二日通信，廣州自十號晚共黨舉事攻佔各機關後，李福林張發奎陳公博黃琪翔朱暉日及艦隊司令酆樂銘等，均退駐河南編軍大營中，會議收拾粵局之法，初以共黨工農多屬徒手，附和之數雖衆，爲數不過千餘人，已分散各處，爲工農軍之前鋒，故議決於編軍中挑選先鋒兩營，由海軍艦隊掩護，由梯德河面渡河攻擊，此計劃於十一號晚實行，所有渡河各軍，均以白帶爲號，打青白色旗，由江大艦掩護渡河北岸，本因共黨工農軍人數衆多，沿廣九路劇戰，傷亡頗重，編軍因此頗有損失，退回河南，同時有福林先鋒一營，由省河正面登岸，欲直攻公安局，沿線新路段戰，不能得手，李福林等以共黨收繳全市區警槍，爲數已多，不易撲滅，乃於十二號晨到廣決，調駐江門之澤枝一團，及駐黃埔之黃慕松部一團，駐虎門之許志銳部一團，赴日集中河南，參線向河北總攻，議畢即遣某要人赴沙面借用某外艦無線電拍往各軍，着其準備，并由馮祝萬派遣江大江固等艦，分赴江門黃埔虎門三處截軍回河南，計期虎門黃埔兩處軍隊，十二號下午可到河南，故定十三號早一時，各軍分數路向河北進發，約黎明同時總攻擊，據某當局談，河南現駐有編軍三千人，駐虎門之許部有一千五百人，駐黃埔之部隊有二千八，即江門潛開趕不及，亦有軍隊七千餘人，另有海軍掩護，今晚向河北全線反攻，定有把握，此次廣州事變，隱觀之似突然起事，其實共黨蓄謀已久，蓋第二方面軍原爲第四軍在武漢擴充而成，原日在粵出發之第四軍，已於北進諸役，傷亡十之七八，現在中下級軍官，多屬在武漢補充，其中大半爲新演遣在武昌所轄之軍官教導團學生，此次舉事，全屬共產，東征事起，第二方面軍全師移贛，比抵贛而武漢變決裂，第二方面軍中之共產分子，即大爲煽誘，欲回師武漢，改組政府，然當時軍在武漢尚盛，知難負歉，其中級幹部者主靜待時機，其急激者即在南昌舉事，此即葉賀兩軍離張而獨立之原因也，當南昌舉事之時，張發奎已知其部下領共者多，不易駕馭，乃將軍權全交賀琪翔，僅其名義上領總指揮，而自己離開軍隊，逕赴九江，由九江轉漫回港，蓋已知部下之不可靠，故藉總指揮之高位，以擺脫責任，而保其不受叛己，而已則又可暗中與共黨合作，以圖東山再起，其後第二方面軍到粵，李濟琛所部李福林等，因與張發奎素有芥蒂，而解決在粵之李宗黃諸軍，桑梓之樓，已在掌握，然張氏以軍中既有領共份子，當慮其有特殊舉動，則影響非輕，故返粵之初，曾密商之黃琪翔，欲先自消滅軍中之跨黨份子，黃以恐激變爲言，事遂中止，開事琪翔本人，亦爲領共份子，其軍部中另有小組會議，張發奎亦不能參加，此小組會議，全以領共份子爲中堅，經培南許志銳等領之團長以下各軍官，均有加入，故當時黃琪翔等聚談朱暉日部之許志銳一師，時已就李濟琛已經培南附己，而經以格於其部下之反對，不能不藉假避香港，（聞經乘今在港），全師由副師長吳奇偉統率，）其部下舉全體加入倒黃運動，消此小組會議之力，亦四第三國際廣州支部之命令也，黃琪翔本人既爲領共派，故共產首如蘇兆徵，施卜譯綺園楊殷安諸人，均均匿跡羊城，無日不分遣黨徒，指揮敢隸工人代表大會各部分工人，爲暴動準取政權之工作，各左翼工會代表，亦參加此小組會議，即前李派得出粵省政府後，助省政府分防東西兩江，先後逃出後，朱暉日李福林等，爲不贊成，主張仍由特別法庭審查處斷，知非改組政府，不易逃，到其主張，乃決策出事，其計畫爲以近郊武裝農民二千人，集中觀音山附近，分頭向廣九鐵路，以阻李濟琛入省之師，後準大隊入省爲主力，以第四軍教導團武裝黨員一千五百人，在省城響應，省農民之先鋒部隊，其餘各工會各自召集體育隊，不論徒手武裝，聞號齊起，響應，奪取警察機關，佔領機關公署，最定十八晚各路齊發，計劃甚詳，集中之農團軍，爲朱暉日偵悉，聞發起召集各軍會議，決調保安隊及編軍前往撲滅，其實開變，乃先發制人，聞變更計劃，由教導團發難，由工代會命各工會糾察體育各隊，分投集中先攻古公安局，以火及於各機關，此時近郊農民，亦入省與其總所部接觸，此即謠傳莫雄被綁槍之原因也，此次共產動手，以領軍艦隊編軍，及四軍教導團以外之各部，多未同情，（二）黃琪翔態度不明，環境不容，車後亦有悔意，（三）近郊農民被其雄部繳械，不及到省援應，已爲編軍渡河堵截，有此三因，故共黨占領廣州，當然不能久持也。